

“吴头楚尾”的考古学观察(之一)*

◆ 唐锦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对于江西地区东周时期的历史状况,以往多信从文献记载。《舆地广记》在“江南西路”条下称“春秋战国属楚^①”。《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春秋时为楚之东境,吴之西境。七国时全为楚地^②”。春秋晚期越灭吴后顺势占据了“故吴地”,此区域成为越的控制区域。到战国中期,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综上所述,江西在东周时期先后是吴、越、楚国的控制区域,是吴楚交汇之地,因此人们多用“吴头楚尾”或者“楚尾吴头”来概括。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有“《职方乘序》:‘吴头楚尾’”之语。祝穆的《方輿胜览》即称“豫章之地,楚尾吴头”。“吴头楚尾”成为概括江西东周时期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

对于“吴头楚尾”的具体历史状况,已有学者勾勒出大致的框架和发展历程:最晚到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的势力已达赣西北,是所谓的“南楚”之地;春秋晚期,赣江下游地区一度全被吴所占领;越灭吴以后,此地归越统治,同时楚也收复失地;楚灭越后,这区域尽数归楚;徐人也曾在此地活动;赣南之地原为“百越之地”,到战国中期以后,也全纳入楚的版图^③。以上仅为概述,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和必要。本文准备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依托历年来的文字出土、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略行狗尾续貂之举。

“吴头楚尾”首先是国家政治疆域的概念,表明江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被纳入了某个国家的统治秩序中。纵观前人所述,这些国家主要有吴、越、楚、徐等。

吴国的统治核心区域在长江下游地区^④。吴国的控制区域是否到达江西,近人多举文献中的“番”、“艾”两地,来证明赣北地区属吴。“番”见于《左传·定公六年》,“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

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都,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时为公元前504年,在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时期。此事又见于《史记·楚世家》,“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饶州鄱阳县,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番县,属九江郡,汉为鄱阳县也”。据此有学者认为番即今之鄱阳县,地处鄱阳湖之东岸,鄱阳县此前已经属楚,鄱阳湖以西的大片地区也是楚国疆域,后为吴国占据^⑤。实际上,随着相关铜器的不断发现,即有学者提出番国在今固始县境内^⑥,固始附近的郟乡城就是其旧都^⑦。也有学者认为在今安徽临泉附近^⑧。不管何说为是,番国均在长江北岸的江淮地区,与长江南岸的江西无关。

有关“艾”的记载见于《左传·哀公二十年》,“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遂适楚”。杜预注曰,“艾,吴邑。豫章有艾县”。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艾县,春秋吴艾邑。西汉置县,属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修水县西司前乡龙岗坪”^⑨。1964年,在龙岗坪古艾城遗址以西10千米的上杉乡曾家山出土有战国时期郢于和钟(或为勾鐙)各一件^⑩,表明此处有东周时期遗存。“艾”位于修水上游。由此向西翻过幕阜山即可到达湘北地区的汨罗江流域,与已经占据此地的楚国发生直接联系。

江西出土有与吴国相关的铭文资料——“者减钟”。据《西清古鉴甲编》记载,“乾隆二十有六年临江民耕地得古钟十一”。临江即江西临江府,是今樟树市等地。十一件铜钟中十件有铭文,可分为两组。铭文开头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工𡗗王皮𡗗之子者减,择其吉金,自乍遥钟……”。两组器物的器主均是“工𡗗王皮𡗗之子者减”。器主“者减”为吴国某王(“皮𡗗”)

*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20&ZD247)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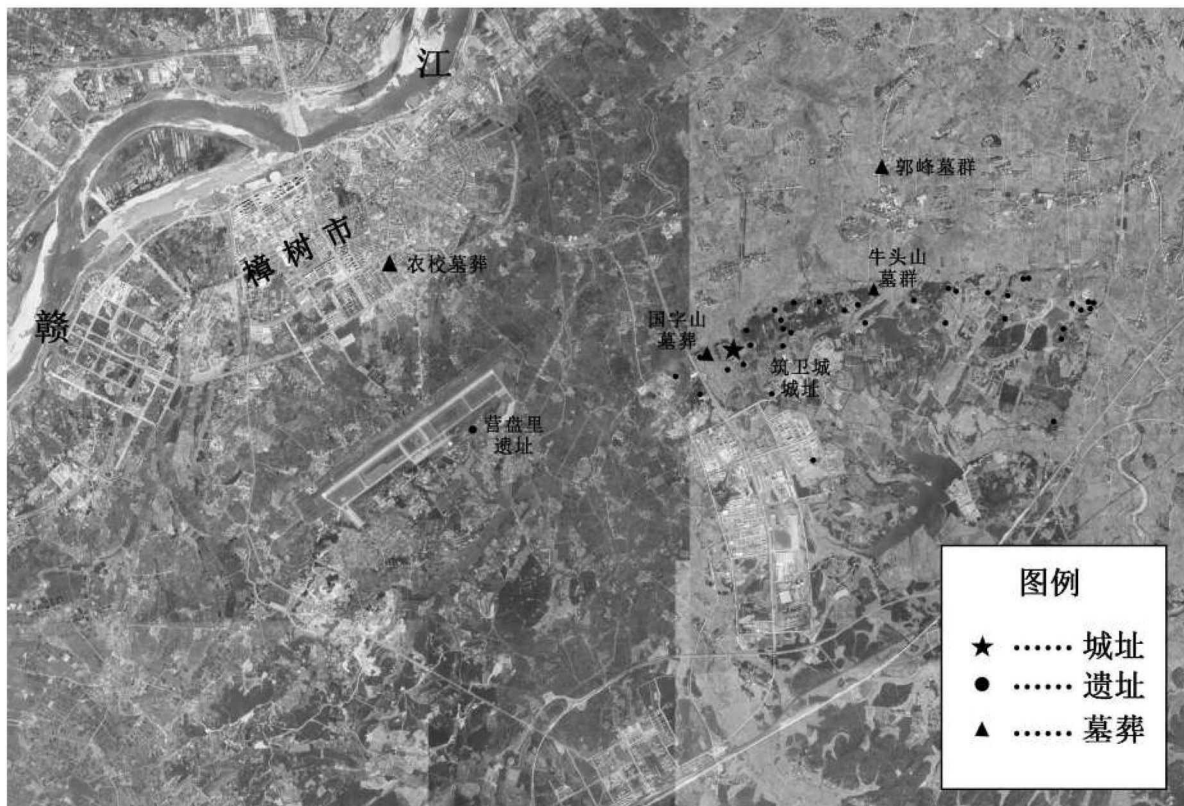
之子,是吴国王室成员。但“者減”究竟是何人,各家还是莫衷一是。王国维先生认为“皮黻”是“颇高”,杨树达先生认为“皮黻”是“柯转”。郭沫若先生认为“柯转即此皮黻也。……柯转之子为颇高,颇高之子为句卑。……此者減与颇高为兄弟,约当春秋初年”^⑩。马承源先生将器物时代定在春秋中期,认为吴王皮黻就是毕轸,即句卑,者減与句卑下一位吴王去齐兄弟行^⑪。李家浩先生则认为皮黻是吴王阖闾,者減是文献记载的吴王阖闾之太子波^⑫。董珊先生赞同唐兰先生的看法,并有所发挥,“假设‘皮然’即吴王诸樊,则‘者減’可能是后来的吴王光(阖庐)”^⑬。不管各家说法如何,时代大致属于春秋中期或晚期。

越国的统治中心在钱塘江南岸的绍兴一带,发现有以印山大墓(允常墓)为代表的一系列越国高等级墓葬^⑭。根据文献记载,越的控制区域,“封域极隘。……其西南至于姑蔑,则在今衢州府龙游县。然昔人称余汗为越地,淮南王安谓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汗界中。《通典》亦未谓之越之余。则自江西广信之饶州皆越之西界”^⑮。明清时期饶州府管辖范围包括今景德镇市、波阳、余干、余江、万年、德兴和乐平等地^⑯,属赣东北地区。由文献记载看,赣江以东部分是越国的控制范围。

江西地区发现的越国铭文资料有清代末年出土“能原铸”2件,分为甲、乙两组器。其中甲器铭60字(《殷周金文集成》第155),出于“江西临江县”;乙器

铭48字(《殷周金文集成》第156)于“光绪庚寅(1890年)瑞州东郭外锦江中鱼人得之”^⑰。清代江西并无临江县,仅有临江府,下辖清江(今樟树市)、新淦(今新干县)和新喻(今新余市渝水区)三县^⑱。怀疑此处临江县当指临江府。瑞州即今江西省高安市,锦江即由流经城边。这两处地点相距不是很远,为何分隔两地,抑或是原为一同出土,流散所致?原因不得而知。两件铜钟上铭文均为鸟虫篆体,且过于残泐,难以读懂,以往称作“奇字铸”。对于铭文所涉内容,曹锦炎先生认为“反映的是越国和邾国的一次会盟,并将铭辞记录在案”,“制作年代可定在公元前473年或稍后”,后进一步修正为记载了“越国主持的莒、邾分界会盟的内容”^⑲。王辉先生认为这两件器物与公元前529年越大夫常寿过参与楚国内乱有关^⑳。虽然各家意见不一,但这两件器物当如容庚先生所推定的“乃越国器也”^㉑。由钟的形制、纹饰等推断,时代当在春秋晚期。

吴国和越国的这两批文字材料均发现于清江盆地内。清江盆地地处赣江下游的上段,西侧承接袁江和肖江等赣江支流,北侧与锦江流域相邻,东侧为抚河流域。清江盆地是江西先秦时期考古工作开展较为充分的地区,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樊城堆文化、商代的吴城文化等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即在此命名,有新干大洋洲墓葬、吴城遗址、牛城遗址等一系列重要的商代和西周时期遗存。进入东周时期后,本区域最重要的考古遗存是筑卫城城址。城址东西410、南北360



图一 筑卫城及周边遗存分布示意图

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城址周边有高耸城墙环绕,现存最高处达21米。城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发现^②,1970年代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③,2011—2012年,在城内发掘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④。发掘者推断城址“是建在春秋文化层之上,它的上限不会早于春秋;其下限也不会晚于汉代”^⑤。此后又有学者通过对发掘资料的梳理,推断城址的时间年代为战国早中期^⑥。筑卫城周围还分布着大量同时期遗址。2011—2012年,在筑卫城周边约36平方千米范围内复查和新发现古文化遗址有38处^⑦,构成一处等级有差的聚落群。附近还有国字山墓群、郭峰墓群、牛头山墓群等附属性遗存。国字山墓群^⑧位于筑卫城西侧,相距仅300米。墓群内已发现五座大中型墓葬,这些墓葬大多呈东西向中字形墓葬,有些周围有围沟环绕,表明墓主地位之高贵,时代在战国早中期。郭峰墓群^⑨位于筑卫城东北方向约4千米处,共发现三座墓葬。其中郭峰墓的封土犹存,高约5米,直径15米。其中的郭峰塬墓葬进行了清理。墓葬是一座东西向土坑竖穴墓,残存有2件青铜鼎、壶、鉴,绿松石饰件以及原始瓷碗等。根据出土物推断墓葬的时代在春秋时期。牛头山墓群^⑩位于筑卫城以东5千米的沔下邹家村后的牛头山。共发现6座墓葬,先后清理其中4座。根据出土遗物推断,这批墓葬的时代在战国时期。在清江盆地内,还零散出土一些东周铜器。1974年在樟树临江镇出土1件青铜鉴^⑪,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吴王光鉴等类似,时代在春秋晚期。1955年在樟树农校发现了一座墓葬,出土有一件窄平沿双环竖耳鼎,属越式鼎,时代在战国早期^⑫。1980年也是在樟树农校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把青铜剑,时代约在战国时期^⑬(图一)。

清江盆地发现数量众多的东周时期遗存,是江西境内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盆地内的筑卫城是迄今为止江西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城址,应该是一处统治中心。结合在盆地内发现与吴、越两国相关铜器,筑卫城较有可能与吴、越两国有关,或是两国在此设置的边邑。考虑到历史上的吴越相继,筑卫城的主人可能也发生过更替。

楚国是东周时期的南方大国,早先位于江汉地区,逐步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开疆拓土。由于山地阻隔,楚国进入江西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线路是顺长江而下,经鄂州、黄石进入赣西北,再顺赣江西岸深入江西腹地。这条线路上有铜绿山、瑞昌铜岭等重要矿冶遗址,是重要的青铜资源产地。铜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楚人是必须牢牢控制的。楚人进入的过程是本土文化和楚文化此消彼长,楚文化因素逐渐居于主要地位的过程。通过阳新大路铺^⑭和大冶五里界^⑮等的发现可见本地原有的独特文化,与楚文化差异显著。如五里界城址内出土的本地文化中陶鬲均为刻槽鬲足,楚文化的鬲足是不刻槽的圆柱形绳纹鬲足^⑯。在大

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发掘^⑰表明本地春秋中期以前主要表现的是当地吴越文化,以后则以楚文化为主,共存有本地吴越文化特征,已经属楚境^⑱。近年来在瑞昌铜矿遗址发现的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的典型楚式遗物,也体现了楚国对这里的控制^⑲,表明楚人势力进入赣西北,掌控了瑞昌铜岭等地的铜矿资源。瑞昌桂林乡发现两件铜鼎^⑳均为越式鼎,一为盘口鼎,另一为盆形鼎。但后者口沿外侧有一道箍附加,是楚系箍口鼎(铤鼎、鐃鼎)^㉑的因素,足根部的兽首也是楚系铜鼎中常见的做法。安义曾年发现一座春秋中晚期墓葬,据报道出土有簠、簋、壶、盘、洗(匜)等铜器^㉒,其中仅发表方形铜器座和瓦楞纹铜罐^㉓。方座形器呈盂顶型,上有立杆。立杆饰镂空绚索纹,器身通体饰蟠龙纹。此类器物发现多件,以荆楚地区发现最多^㉔。这件器物应该是楚文化传入的产物(图二)。

另一条线路是由湖南经萍乡、宜春,顺袁江而下进入赣中腹地。在这条线路中,位于湘中的长沙是关键性节点。在长沙发掘了大量楚墓,时代最早的属春秋晚期^㉕。因此,楚文化由此在进入江西的时代当不早于春秋晚期。萍乡田中古城^㉖位于湘江支流萍江河畔,正处于由湖南进入江西的通道上。城址平面略呈梯形,城墙周长约777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城址废弃于春秋晚期。有学者将城址的废弃与春秋晚期楚昭王南侵百越联系起来^㉗。萍乡以南的莲花县桐鼓堆发现一座战国中晚期木椁墓^㉘,形制、出土遗物等有着浓郁的楚文化因素。两者都反映了楚文化由西向东进入江西的过程。

楚势力是否进一步推进到赣中腹地呢?近人虽有



图二 安义春秋墓出土铜方座形器

将简牍中的地名放在江西^⑩，但还是缺少其他资料的佐证，仅供一说。鄂君启节^⑪是关于战国中期楚国交通路线的重要资料，记载了以鄂(今鄂州市)为中心的陆路和水路路线。其中东路水路是“逾江，庚彭泽，庚枞阳，入庐江，庚爰陵”，即由今鄂州出发，越过长江后，直接越过古彭蠡，到达彭泽(疑今望江)和枞阳等地，进入皖西南的群舒地区^⑫。这条线路直接略过江西，很可能是因为楚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对江西实施有效的管辖，因此未纳入交通线中。

1976年，在赣江中游的遂川出土铜戈和铜矛各1件，以及铜、铁镞等，其中铜戈有铭文，作“廿二年临汾守潭库係(?)工献造”^⑬。这件器物据考证或认为是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所造，也有认为是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制作的^⑭。不管何为是，均表明战国晚期到秦代，中原的政治势力已经深入赣江的上中游地区。这个过程的先导是建立在楚对江西控制的基础上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方“上赣君之谓欽”^⑮的楚印，表明楚国已经掌控了赣江上游地区，并设置有封君。何浩先生认为赣江上游地处偏僻，是吴起助楚悼王变法后才为楚占有，时间很有可能在战国晚期^⑯。

徐国是东方大国，“(周)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到春秋中晚期，徐国周旋于吴、楚、齐等国之间，《左传》等多有记载，不再赘言。徐国在鲁昭公三十年被吴所灭^⑰，时为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在位期间。徐国都城或认为在今江苏泗洪县南大徐台子^⑱。近来有学者提出邳州的梁王城和鹅鸭城就是春秋中叶至春秋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⑲。徐国的控制区域当在黄淮东部，与江南无涉。

江西高安和靖安两地先后发现两批徐国的铭文资料。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今高安市西四十五里的清泉市的山下田中发现青铜器十二件，其中“钟铎类”大小九件，觶三件，现存的4件铜器上均有铭文。1979年在靖安水口乡李家出土了三件徐国铜器^⑳上

有铭文。这些铜器的铭文情况可汇总为表一。

由表一可见，这些们资料共涉及两位徐王名号“㒺又”和“义楚”。义楚当即文献中的“仪楚”，事见《左传·昭公六年》，“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属春秋中后期。董楚平先生将另一位徐王“㒺又”也定在鲁昭公时期，为义楚前的一位徐王^㉑。两人的时代大致在春秋中晚期。其他两人均是徐王下属的职官。赵平安先生将铜铎铭文中的“醯尹”的“醯”字释作“醯”，认为醯尹是职官名，与醯人相当^㉒。《周礼·天官》记载：“醯人掌四豆之实，以共王祭享之用”。这件铎的器主当时徐国某位掌管此类职权的官员。令尹则是楚国的最高官职名。《论语·公冶长》中，“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邢昺疏：“令尹，宰也……，楚臣令尹为长，从他国之言，或亦谓之宰”。徐国称令尹或是借用楚国官职用法。这两件铜器的时代也在春秋中晚期。

能原铸的乙器和高安徐器均发现在锦江流域。1986年，在锦江流域的高安太阳墟出土一批铜器^㉓。发掘者认为出于一座平地起封、用熟土掩埋器物的无圻穴土墩墓。其中出土5件铜器和6件原始瓷碗。5件铜器中除1件铜器是铜器口沿外，其余4件均为铜鼎。铜鼎均是扁平足外撇的越式鼎，3件为敛口盆形鼎，另1件为盘口形鼎。3件敛口盆形鼎的形制并不一致，无法构成所谓的列鼎。通过形制推断，这些铜器的时代约在春秋晚期。同时出土的几件原始瓷碗的时代也在春秋晚期。这批遗物的出土地点距出土徐王义楚觶等铜器的地点仅2千米，应该密切相关。

2007年发掘的靖安李洲坳大墓是近年来江西西周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㉔。其位于修水的支流北潦河的下一级支流南河河畔。这座墓葬在李家徐国铜器群地点西南800米处，两者应密切相关。墓葬为带短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上有高大封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没有明显的椁室结构，仅在墓室内密密麻麻放置着1具主棺和47具陪葬棺。墓内出土随葬品多放置在棺

表一 江西出土徐国铜器情况表

器类	铭文	器主	出土地
觶	徐王㒺又之祭崇(觶)，崇(觶)溉之铸 ^㉕	徐王㒺又	高安
觶	唯正月初吉丁酉徐王义楚择余吉金，自作祭崇(觶)，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 ^㉖	徐王义楚	高安
觶	义楚之祭崇(觶) ^㉗	徐王义楚	高安
鉴	徐王义楚择其吉金自作盥盘	徐王义楚	靖安
炉盘、炭铲	应君之孙徐令尹者旨𠄎择其吉金自作炉盘	徐令尹者𠄎	靖安
铎	唯正月初吉日在庚，徐醯尹者故监自做铎城…… ^㉘	徐醯尹者故监	高安



图三 江西东周时期遗存分布状况示意图

内的竹筒内,当分属于各陪葬者。墓葬内仅出有 4 件铜器,包括鼎 2 件,刮纱刀和铜削各 1 件。两件铜鼎分出于 G4 和 G12 中。其中 G4 随葬的铜鼎位于脚部的竹筒中,G12 随葬的铜鼎位于棺外的竹筒中。两件铜鼎的三足扁平外撇,为典型的“越式鼎”。G4 和 G12 内还出有原始瓷钵和杯等。墓内未出有铭文资料,墓主情况不详。由出土器物等推断墓葬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

春秋晚期,徐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是阖闾三年(公元前 512 年)被吴所灭。此后“徐子章禹断……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夷,又名城父,是楚在淮北的重镇,故城在今安徽亳县东南约七十里城父集^⑩。更多的是徐人四处逃散,徐器在各地散出。春秋时期徐器除了集中在徐州附近一些材料外^⑪,其他还包括襄阳蔡坡战国早期 M4 出土的“徐王义楚之元子”剑^⑫,镇江北山顶出土的“甚六”鼎 1 件、“濋邳”钟 7 件、“濋邳”钲 5 件、“甚六之妻”鼎 1 件和“尸祭”缶盖 1 件^⑬,绍兴塔山公园出土的“自”铎^⑭,绍兴 306 墓出土的“徐王元子”炉和“徐濋尹瞽”鼎各 1 件^⑮,分别发现于楚

国、吴国、越国和江西地区。因此有学者提出是楚将徐的子孙遣散到楚境各地^⑯。修水和锦江都位于赣江西岸,北侧即是在楚掌控下的沿江铜矿带,南侧是清江盆地,未被楚人掌控。在这两处安置逃散的徐人,则有着前哨和挡枪的用意。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高安、靖安和绍兴 306 号墓发现的徐器均是“王+臣”的组合方式。高安发现徐器器主组合是“徐王圻又+徐王义楚+徐濋尹者故监”。靖安发现徐器器主组合是“徐王义楚+徐令尹者型”;绍兴 306 号墓内徐器器主组合是“徐王元子+徐濋尹瞽”。与之发生对照的是徐国腹地的邳州九女墩 M2 及 M3 内均只出有铭徐王子孙铜器。这些都反映了国灭后徐人逃散后的狼狈和局促,只有拼凑用不同器主的铜器来维持自己的尊严。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在春秋中晚期,随着吴楚争霸的展开,多种势力汇聚于此,形成了复杂的历史局面:楚由西北方向进入赣西北;吴、越两国先后在赣中地区活动;徐人逃散以后,被楚人安置针对吴、越边邑的前沿地带。随着越灭吴,吴楚争霸戛然而止,曾经波澜微兴的赣鄱大地重新归于沉寂,直到战国晚期到秦

代,江西地区才又重新纳入人们视野(图三)。

注:本文配图承蒙王源制作。

注释:

- ①《輿地广记》卷二十五。
-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江南道四。
- ③彭适凡:a.《“吴头楚尾”辨析——江西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归属问题的探讨》,《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1期;b.《江西通史·先秦卷》,第234~25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④张守节《史记正义》里称“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但多年的考古工作,并未在梅里发现相关遗存,而在镇江地区的大港—谏壁一带发现了以宜侯矢簋为代表的—大批西周早期遗存。据此有学者认为此处是吴国较早的都城所在。吴国后期都城苏州,以往都认为在今苏州老城区。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学界又分别提出了太湖西北角的阖闾城和东北角的木渎古城是吴国晚期都城的说法。参见 a.唐兰:《宜侯矢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b.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c.王玉国、肖梦龙、陆九皋:《镇江吴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d.张敏:《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e.叶文宪:《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9卷第2期。
- ⑤彭适凡:《“吴头楚尾”辨析——江西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归属问题的探讨》,《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1期。
- ⑥李学勤:《论淮间春秋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 ⑦黄盛璋:《当阳两戈铭文考》,《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 ⑧袁进:《番国地望新说》,《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 ⑨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5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⑩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乐器和汉代铁器》,《考古》1965年第6期。
- ⑪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卷三,第15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 ⑫马承源:《关于甬生盃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年第1期。
- ⑬李家浩:《攻敌王者偃戈又剑与者减钟》,《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三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
- ⑭董珊:《吴越题铭研究》,第41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 ⑮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等:《绍兴越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
- ⑯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疆域表卷四》,第547页,中华书局,1993年。
- ⑰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19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第119~125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年。
- ⑲吴畏编著:《赣輿浅图——概说江西八十古县》,第7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
- ⑳曹锦炎:a.《“能原”铸铭文初探》,《东方博物》(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b.《再论“能原”铸》,《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期。
- ㉑王辉:《“能原”铸臆解》,《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
- ㉒容庚:《善斋彝器图录》,转引自王人聪:《能原铸铭试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期。
- ㉓饶惠元:《江西清江县的古遗址、古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 ㉔a.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6期;b.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2年第2期。
- 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筑卫城遗址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 ㉖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6期。
- ㉗唐锦琼、王意乐、张建仕:《筑卫城城址的时空构架》,《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 ㉘a.饶惠元:《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清江盆地考古调查简报(2011~2012年度)》,《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 ㉙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国字山墓地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文物》2020年第3期。
- ㉚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观上春秋墓》,《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 ㉛a.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战国墓清理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b.陈文华、程应林、胡义慈:《清江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工作资料》1976年第1期。
- ㉜陈柏泉:《春秋铜鉴》,《文物工作资料》1975年第3期。
- ㉝彭适凡:《江西通史·先秦卷》,第240~24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㉞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9)——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第83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
- 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文物出版社,2013年。
- 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及周边遗址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及周边遗址考古报告》,第24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第一次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

⑰陈丽新、陈树祥:《试论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性质》,《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

⑱崔涛、刘薇:《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新发现与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⑲何国良、冯利华:《瑞昌市郊出土两件春秋铜鼎》,《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⑳a.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14~11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b.张闻捷:《楚系青铜礼器制度研究》,第33~3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㉑刘娟:《铲土车掘出9件青铜器》,《江南都市报》2007年5月15日,https://jndsb.jxnews.com.cn/system/2007/05/15/002480691.shtml。

㉒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9)——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第80~81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

㉓此类器物分别发现于分别发现于安徽屯溪 M3、绍兴 M306、浙川下寺 M1、浙川和尚岭 M2、光山黄君孟夫妇墓、枣阳郭家庙 M17 和长清仙人台 M4 等处。2处在长江下游,1处在齐鲁地区,其余均在楚文化区域。

㉔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465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㉕萍乡市博物馆:《江西萍乡市田中古城遗址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2期。

㉖唐际根、彭安保:《田中古城背后的楚与百越》,《考古》2001年第2期。

㉗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萍乡市博物馆、莲花县博物馆:《江西莲花桐鼓堆东周木椁墓考古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七十三辑,中国书店,2019年。

㉘战国中期的包山二号墓出土楚简中有名“郢君”的楚国封君(简180)。何浩、刘彬徽认为“郢”字通“锦”字,将其与锦江联系起来,可能在锦水流域的宜春或者万载地区。郑威认为“郢”和“淦”从金声,君封邑在淦水流域的可能性较大,并认为筑卫城即其封邑。参见a.何浩、刘彬徽:《包山楚简“封君”释地》,《包山楚墓》,第57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b.郑威:《楚国封君研究》,第180~18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㉙《殷周金文集成》12113。铭文释文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下不一一注明。

㉚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水长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

㉛江西省博物馆、遂川县文化馆:《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考古》1978年第1期。

㉜转引自徐世权:《秦“二十二年临汾守戈”考》,《简帛》(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㉝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第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释文参照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

则)》,《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㉞何浩:《楚国封君封邑地望续考》,《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

㉟《左传·昭公三十年》:“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迹巨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㊱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21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㊲孔令远:《春秋时期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

㊳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国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㊴《殷周金文集成》6506。

㊵《殷周金文集成》6513。

㊶《殷周金文集成》6462。

㊷《殷周金文集成》425。

㊸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71~27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㊹赵平安:《释“𠄎”及相关诸字——论两周时期的职官“𠄎”》,《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2002年。

㊺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高安县博物馆:《高安太阳墟春秋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

㊻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考古》2008年第7期;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靖安县博物馆:《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2期。

㊼陈怀荃:《春秋楚地浅释》,《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一至第八辑)》,1979年。

㊽主要出土于邳州九女墩二号和三号墓,参见a.南京博物院、徐州市文化局、邳州市博物馆:《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b.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钟铭文考辨》,《考古》1999年第11期;c.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d.孔令远:《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㊾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㊿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㊽曹锦炎:《自铎铭文考释》,《文物》2004年第2期。

㊽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㊽彭适凡:《春秋徐国南疆析疑》,《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